

因难见巧： 名家翻译经验谈

金圣华 黄国彬 主编



言一

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

金圣华 黄国彬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 / 金圣华，黄国彬主编.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3

(译家之言)

ISBN 978-7-5135-5685-9

I. ①因… II. ①金… ②黄… III. ①翻译学—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3855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系列策划	吴 浩 易 璐
责任编辑	李旭洁
装帧设计	李双双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9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5685-9
定 价	42.00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9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www.fltrpstore.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256850001

新版序言

——向译道引路人致敬——

《困难见巧》，刊印于十八年前有关“名家翻译经验谈”的一本书，年初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邀约重版，不久将以崭新面貌付梓。

这本书是由我和黄国彬一起主编的。当年我们有感于译坛名家辈出，译果丰硕，但是坊间有关各家翻译名著过程的文章，却东鳞西爪，散见于报章杂志，乃决心将之编撰成集，传诸后世。

我们先有编书的构思，继而分别出发向名家邀稿。余光中、林文月、思果、高克毅、杨绛、杨宪益、叶君健、萧乾、罗新璋、刘绍铭、金隄等都是译道先驱，学林硕儒，他们各自翻译的名著，全为殚精竭虑、千锤百炼的成品，因此如能邀请他们现身说法，把翻译过程的甘苦和心得娓娓道来，则必将对译途后学大有裨益。

邀约的过程既顺利又感人，各位名家都不吝赐稿，有的将已发表的精彩文章见赐，如余光中惠赐《与王尔德拔河记——〈不可儿戏〉译后》，杨绛惠赐《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萧乾惠赐《叛逆·开拓·创新——序〈尤利西斯〉

中译本》，叶君健惠赐《谈文学作品的翻译》，金隄惠赐《论等效翻译》，刘绍铭惠赐《以一人“译”一国》等；有的则为文集专诚撰稿，如思果、高克毅、杨宪益、林文月、罗新璋各位。高克毅说凡是翻译过的文学作品都曾写过“译后语”，唯独《大亨小传》，“始终没有动笔谈过其中的前因后果。现在趁金圣华、黄国彬两位教授之邀追溯一下，也算了却一桩心事。”杨宪益说：“我最近正在搬家忙乱之中，应圣华之约，草草写了几千字，不过还是老生常谈，惭愧之至。我年已逾八十，早就应该封笔了。但愿这一次是我谈翻译问题的最后一次。”能够在这本集子中，催生出高先生谈论翻译《大亨小传》来龙去脉的文章，杨老谈毕生翻译经历与体会的封笔之作，的确弥足珍贵。此外，林文月在文章里披露个人翻译三本日本文学史上最重要经典名著的心得，蔡思果谈论翻译《大卫·考勃菲尔》的艰辛译路历程，罗新璋阐释“译作”的要义等，都是特地为文集撰写而不可多得精彩论文。

在重读文稿的过程中，发现越是成就卓越的大译家，越是虚怀若谷。余光中在文章里提到翻译王尔德的种种难题，他说：“其他的难题形形色色，有的可以克服，有的可以半悬半决，有的只好放弃”；林文月在《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翻译的省思》一文中，提出实际翻译时遭遇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暂时解决的心得，她说：“在我回顾过去二十年的这些经验而撰写本文时，心中难免仍存在着自省与不安”；蔡思果在文末说：“书出来了，读者是最公道、最有眼光的批评家，我十分惶恐地等待他们的批评”；高克毅一开始就表

明“我不是‘名家’，只是个莫‘名’其‘巧’的翻译者”；杨绛说：“我翻译的书很少，所涉面又很窄，几部小说之外，偶有些文艺理论，还有小说里附带的诗，仅此而已”，所以这位翻译出《堂吉珂德》而获得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的大翻译家，就以《失败的经验》为题，来试谈翻译；杨宪益提起翻译说，“我的思想从来逻辑性不强，自己也很怕谈理论，所以也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凡此种种说法，并非译家故意作态的矫情之词，而是他们在译道上常年跋涉，遍尝艰辛后的肺腑之言。他们是漫漫译途上的先行者，这本书，就是他们在仆仆风尘之余，以如椽之笔写下的宝贵经历。他们的睿智隽言，就如攀山夜行中的引路明灯，照亮了丛林中的条条曲径，使后来者不至于颠仆其上，失去方向。

此书再版之际，多位译界名家，如叶君健、萧乾、思果、高克毅、金隄、杨宪益诸位，已经先后辞世，令人不胜唏嘘，然而他们在译坛上留下的译品译论，历久弥新，恰似一座座洁白的丰碑，永远屹立不倒。¹

谨以《因难见巧》新版，向所有过去与现在的译道引路人致以最深的怀念及最崇高的敬意。

编者

2014年11月7日

1 本书再版时，经出版社要求，为版权授权事曾经征询各位撰稿者或其家属、后人的同意，因无法接触到金隄后人，故只能将其大作割爱。又为增篇幅，特在新版中加添金圣华《从“传译”到“译传”——兼谈文学翻译中的“探骊”与“得珠”》一文及黄国彬《知其不易而为之——谈英诗汉译》一文。

主编序言

《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一书的编汇，由最初的构思，到邀稿撰集，大约经历一年时间。以一部罗列十多位当今译坛名家鸿文的集子来说，成书不可不谓顺利。

大约数年前，本书编者之一在编辑《傅雷与他的世界》一书时，搜集了不少资料，在披阅选稿的过程中，发觉翻译家高洁耿介的个性以及恢弘豁达的气度，每每在同侪后辈所撰的纪念文章中，一一展现。但遗憾的是，傅雷毕生翻译过五百多万言，三十余部文学杰构，而评论傅雷翻译成就的文章，竟然寥寥可数。再者，译者叙述自己长达二十多年翻译生涯的文字记录，更少之又少，坊间流传的只有《翻译经验点滴》、《与罗新璋论翻译书》以及《〈高老头〉重译本序》等零星的几篇。译者对自己翻译的总体评价，对自己翻译某部经典作品的心路历程，以及对翻译理论的体会心得等，只有在致友好如宋淇等人的信札中，方零散可寻。编者有见及此，深恐在当今译坛繁茂瑰丽的园地中，不少名家毕生献身译事，成就非凡，但是极少人会有意识地将自己翻译经典名著的过程，例如译前的准备、译时的甘苦、译后的心得，以及因而推展出来的译论，详尽地记载下来，披露人

前。即使偶尔发表了这类文章，也时常只是散见各地，缺乏有心人将之编汇成集，整理出一套有价值的文献来，传诸后世。基于这些原因，遂萌生编辑《困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一书的构思。

编汇本书的目的，既然如此明确，于是就想到邀稿的对象，亦必须谨慎郑重地小心选择。在我国译坛上译作丰富的名家，为数甚多；译论精辟的学者，亦颇不乏人，但是真正以译艺名闻遐迩，而又能以译作现身说法的高手，毕竟尚属少数。环顾大陆、港台乃至海外的当今译坛，杨绛、杨宪益、萧乾、叶君健、余光中、林文月、高克毅、思果、刘绍铭、金隄、罗新璋等名家，确属译林硕果，以译文优美、译论精要见称于世。这些名家，不但翻译经验丰富，翻译论述独到，而且往往身兼学者或作家，在研究著述两忙之余，仍然献身译事，诚属难能可贵。本集编者要能邀得这许多名家惠允赐稿，汇编成集，绝非易事。所幸每一位大家都在百忙之中，抽暇鼎力协助，先后惠赐鸿文，或将已发表的精彩之作见赐，如杨绛、萧乾、叶君健、金隄、余光中、刘绍铭诸位；或为本文集专诚撰稿，如思果、高克毅、杨宪益、林文月、罗新璋等各位。不论是已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章，全都见解卓越、内容翔实，使文集得以增添光彩，在此谨向各位译家致以万分的谢意。

上述各位，确属当今译坛上最有代表性的名家。本集编者有幸与他们相识相交，各有渊源。

1985年初，香港翻译学会执行委员会为了对内地翻译界增加了解，特前赴北京与上海访问，并与各有关方面广泛

接触，促进交流。在当时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姜椿芳和副秘书长林煌天两位先生的热心协助之下，曾经参观及拜会不少有关单位，当时会见了不少译坛宿将，杨绛、杨宪益、叶君健等各位名家，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记得在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那天，会谈的席次正好将本书编者安排在杨绛女士及罗新璋先生两位之间，席间曾就翻译问题向两位请教，得益匪浅。杨绛女士当时说，她认为翻译一部文学名著，必须努力钻研各种有关的背景资料，再以极度严肃的态度，审慎下笔。那时候，她刚从巴黎等地游学归来不久，因在国外发现不少有关《堂吉珂德》的原始资料，正准备倾注全力，把这部西班牙经典名著重新校译一遍。杨绛女士并说待翻译完毕，要写一篇《慢镜头下的翻译》，把自己翻译过程中每字每句的斟酌，如何一步步演绎蜕变，都如实记载下来。她之所以这么做，不是为了炫耀自己如何比人强，而是想要把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及改正错误的正确途径，逐步详记下来，从而指出译途险峻，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杨绛女士这番苦心，终于记载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即如今收编在本文集中的《失败的经验》，这篇文章成为一篇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编者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向学生推介，使后进者能从中学习，有所启悟。

叶君健先生是翻译《安徒生童话》的名家。据他自己说，年轻时远游欧洲，为了调剂生活与工作才开始拾起译笔。叶先生精通英语及世界语，在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曾到日本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即返国积极从事抗战的文艺活动。他是少数能用英文创作的中国作家之一，曾出版

《他们飞向南方》、《三季》等英语短篇小说集。1985年初识叶老，当时他精神奕奕、身壮力健且谈兴甚浓，使人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承蒙他惠赐《不丑的丑小鸭》等书，读后对他翻译安徒生的背景，更增了解。1985年后，与叶老时有书信往返，这次由于编汇文集，向叶老索稿，得知他去年曾经大病一场，如今正在康复中。尽管如此，一年来，时时在《香港文学》中读到叶老的大作，可见他虽然身在病榻，依然笔耕不辍，而他在创作及翻译方面作出的贡献，成就斐然。《谈文学作品的翻译》一文，正道出了叶老以文学健笔献身译事的亲身经验。

罗新璋先生是精研傅译的专家，也是中国数一数二专治法译中的高手。编者远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因为研究傅雷的翻译，经傅敏介绍而在书信中向罗先生多次请益了。也许是因为师承傅雷的关系，罗新璋对翻译的态度十分严谨与认真。他的中、法文造诣极深，所译的《特利斯当与伊瑟》，把欧洲骑士文学中这部经典名著的神髓，活龙活现地表达出来，可说是一部难得一见的佳作。最近他更花费了无穷心血，把斯当达的《红与黑》翻译出版。这部作品在中国国内先后有十三种译本，罗氏的力作，呈列其中，以译者的文学素养及翻译功力来说，必能脱颖而出。罗新璋除了孜孜矻矻，勤于译著之外，还专精于翻译理论的研究。1994年10月，他曾应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之邀，来港访问，并在中大及港大以中国翻译史及翻译理论为题，作公开演讲。罗氏有“译事三非”之创说，与严复的“译事三难”，先后辉映，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三非，即“外译中，非外译‘外’；文

学翻译，非文字翻译；精确，非精彩之谓。”他的《释“译作”》一文，是专为本文集而写的，语多精警，对翻译理论，极多阐发。

认识萧乾先生为时更早。七十年代末期，通过一位友人的介绍，已经有幸得悉萧乾先生的事迹与专著。萧乾先生早岁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其后足迹遍布欧美各地，阅历极丰，文笔优美。编者于八十年代初赴欧进修途中，曾在机上捧读萧老忆述年轻时代初恋的精彩小说，记得当时读得津津有味，沉醉于书中所描绘的浪漫氛围中，而浑忘旅途的疲累与困倦。萧老于八十年代，曾先后数度来港，1986年，更应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邀请，出任该学院“黄林秀莲访问学人”。跟萧老晤谈，是一种乐趣，因为这位名闻遐迩的大作家，不但平易近人，且风趣幽默。更难得的是萧老于写作之余，亦十分关心译事，不但曾经多次撰文，向国内介绍香港译坛动态，还现身说法，译出不少各国经典名著。近年来，萧老徜徉译林，不但雅兴未减，且译兴更浓，简直到了乐而忘返的地步。萧老以八旬之年，居然跟夫人文洁若女士携手合作，再创高峰，以数年时间，把乔伊斯名著《尤利西斯》全书译成中文。萧氏伉俪勇闯译者视为畏途的禁区，的确是一项壮举，若非艺高胆大，怎能有此魄力！萧老惠赐《叛逆·开拓·创新》一文，正是《尤利西斯》中译本的序言，对翻译这部洋洋巨著的来龙去脉，叙述得十分详尽。

杨宪益与戴乃迭是译坛上另一对珠联璧合的佳偶。认识杨氏伉俪亦已几达十年。这十年间，杨老数度来港，编者

也几次赴京，每次会晤，都是十分愉快的经验。杨老性情豁达，耿直敢言，虽已届七九高龄，仍然不失赤子之心，对生命热爱，对工作投入，对人对事，执着中不失幽默，认真中常带洒脱。杨宪益自四十年代起，即与夫人戴乃迭紧密合作，携手译出无数卷帙浩繁的经典名著，包括《诗经选》、《楚辞》、《史记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英译，以及杨老独力完成的荷马《奥德修纪》、维吉尔《牧歌》等的中译。杨老与夫人，自结缡至今，不但在生活上同甘共苦，在译事上更合作无间，漫漫译途，已经相偕共闯五十年！1994年2月，杨老与夫人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邀，分别以“新亚书院龚氏访问学人”及“明裕访问学人”身份，来港作为期一月的访问。其间，杨老数度作公开演讲，将其与译事结缘五十年的宝贵经验，详加剖析。当时，编者亦曾跟杨老作过一系列专访，刊载于《香港联合报》上。虽然如此，杨宪益这位译坛上的传奇人物，尽管驰誉中外，译著宏富，却一向对翻译做得多、谈得少。他自谦“怕谈理论”，只有“一点体会”，其实以一位译过数千万言的大师来说，他的体会，正是后学者摸索求进时的引路明灯！由于编辑此文集，当然少不得向杨老求稿，他不但欣然应允，还在六月大暑天，搬家的忙乱与纷扰中，抽暇执笔，实在令人感动！杨老的《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是特地为本文集撰写的，杨老甚至说：“我年已逾八十，早就应该封笔了。但愿这一次是我谈翻译问题的最后一次。”希望此乃杨老忙中戏言，倘若果真如此，则这篇文章即为杨老告别译坛之作，因而更加珍贵了。

金隄先生闻名已久，但迟至1987年方初次晤面。当时金先生与编者同时应邀出席一个有关翻译的大型国际研讨会，还记得那次盛会，参加者众，各位讲者的发言，必须分组进行。编者以译注《傅雷家书》的体会为题，发表论文，席间发现一位神情肃穆、专心聆听的学者，待编者发言完毕，提出许多宝贵精辟的意见，这位学者，就是金隄先生。金先生是当今译坛知名的理论家，著有《等效翻译探索》、《论翻译》等书，对推介现代名家翻译理论，功不可没。金先生不是奢言理论、不事译著的纸上谈兵者，而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锐不可当的译坛猛将。自1979年起，他就献身于乔伊斯《尤利西斯》的翻译，十多年来，曾经遍访海外乔伊斯学者，潜心研究，终于于1993年出版了上卷。金教授现居美国，以访问学者身份先后在英国牛津、美国耶鲁等大学讲学，承蒙他惠赐稿件《论等效翻译》，对翻译研究与教学，均有所启发。

刘绍铭教授早在1970年就已相识。不但相识，还有“同室之谊”。当时因中文大学在草创时期，设备简陋，因此有缘跟正好回港执教的刘绍铭共用一个办公室。日日相处，眼看着这位才华横溢的文坛高手创作、翻译两忙，不由得激发出一点跃跃欲试、涉足译林的勇气。而对教授翻译的兴趣与体会，也或多或少从这位杰出“室友”的经验中，得到了启发。刘绍铭于1971年离开中大，曾任教于新加坡大学、夏威夷大学，1973年重返威斯康辛大学，于1994年9月，应香港岭南学院邀请，以客座教授身份，返港执教。刘教授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学者兼翻译家。他在繁忙的教

学、研究与创作之余，仍然潜心译事，翻译出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著，如《魔桶》、《伙计》、《一九八四》等。刘教授因举家由美返港迁居事忙，不能为文集撰写新稿，但他的《以一人“译”一国》，把个人对文学翻译的看法与原则，娓娓道来，发人深省。

高克毅先生是学贯中西的译界先进。正如杨宪益先生一般，他既擅中译外，又擅外译中，是译坛少数能双向并通、“左右逢源”的高手之一。高先生笔名乔志高，出生于美国密西根州，于七十年代曾长期留港，出掌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译丛》的编辑工作，对推动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贡献良多。高先生主要的译作有《中国幽默文选》、《大亨小传》、《长夜漫漫路迢迢》、《天使，望故乡》等。高先生又为幽默大师，对美国俗语俚语，极有研究，先后出版过《美语新詮》、《听其言也》等书，最近的力作为长达五百八十八页、由读者文摘出版的《最新通俗美语词典》，这部大书是高先生倾注毕生心血的巨构，对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成就超卓。为了编本文集，早在一年前就向高先生邀稿。由于编者深知高先生宅心仁厚，有求必应，所以不但邀稿，还指定题目，请高先生特别撰写有关翻译费滋杰罗名著《大亨小传》的心路历程。原因是这本译作，传诵一时，影响深远，但译者从未将翻译时的前因后果撰笔为文，披露人前。其他作品如《天使，望故乡》等的翻译经过，倒反而有文字记载，因此，不得不提出不情之请，要求高先生为本文集“特别剪裁”，《〈大亨〉和我》一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给“逼”出来的。高先生撰稿之时，正值盛暑，一方面他那部字典

付梓在即，一方面要撰写出席台北翻译研讨会的论文，真可谓忙得应接不暇、分身乏术。但是《〈大亨〉和我》终于如期完成，用快邮速递送传编者手中后，高先生仍然与编者频频以电传联系，三易其稿，可见他治学做事的认真与审慎。高先生虽然在暑天挥汗撰稿，令编者深感歉疚，但文章完成之后，作者与编者均深有同感——好文章是要逼出来的！如今，就把这独一无二的丰硕成果，呈献在读者面前。

林文月教授的文章《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翻译的省思》在1994年初已完成并寄交编者。这篇文章是七月中于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中发表的论文，内容翔实，立论精确。林教授是台湾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加州史坦福大学及柏克莱加州大学客座教授，在其繁忙的教学与研究之余，以翻译日本经典文学名著作为寄情的嗜好。只是这“嗜好”一经开始之后，就锲而不舍，欲罢不能。林教授先后完成了日本文坛鼎足而立的三部古典名著的译注，即《源氏物语》、《枕草子》及《和泉式部日记》，她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贡献卓越，因而屡获文学及翻译成就奖，1995年更荣获“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大学纪念中心赏”。林教授于1994年10月应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邀请，以“明裕访问学人”及翻译系访问教授身份，前来香港讲学，向译界后进讲述自己在翻译古典名著方面的心得。据林教授说，她每译一部作品，都悉力以赴，尽量在译文信实与畅达之间，保持均衡，以维系原文的风格。她认为原著的“韵味”与“氛围”极其重要；换言之，紫式部、清少纳言及和泉式部这三位原作者的译文，必须各有特色，保存原貌，而不是完全掩盖在林文月

的译笔之下，风格如出一辙。承蒙林教授将这篇极具创意的学术论文，惠赐本文集，使读者能在欣赏三本译著之时，细细品尝译者苦心经营、字斟句酌的成果。与林教授结识于十年之前，十年来，相交越久，相知越深。翻译对她，早已从当年的嗜好，变为一种“人家不做我来做”的使命感；而她对翻译的认真与奉献，更足以成为后学者的表率。

在思果先生的翻译生涯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可敬可佩的奉献精神。

思果先生原名蔡濯堂，是当代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曾获台湾重要的散文创作奖。蔡先生的散文有陶诗的平易深醇；举凡大事、小事、物理、人情，到了蔡先生笔下，都会变成亲切耐读的文章。不过蔡先生的翻译并不让他的散文专美，几十年来他译了二十多种作品，是真正的翻译等身。由蔡先生翻译的字数，应该以百万还是千万计算呢？就要等专人研究了。

在翻译的战场上，蔡先生身经百战，是能够随时出击的常胜将军。有一次，香港翻译学会邀蔡先生谈翻译。蔡先生进入会场时对周围的人说：“可没有准备啊！”一位熟悉蔡先生翻译造诣的朋友闻言，不假思索地笑着说：“李小龙打架，要准备吗？”蔡先生听了，客气地回答说：“我可不是李小龙啊！”然而在座谈会上，轮到蔡先生发言时，大家听到的完全是译界李小龙的练武经验。

蔡先生和李小龙相同的地方，是二者都有精湛的武功；不同的地方，是李小龙没有留下截拳道理论，蔡先生却写了许多有关译道的文章。他的《翻译研究》和《翻译新究》，

是许多翻译系学生的必备参考书；在香港某所大学里，更名列“十大好书”榜上。就这一点而言，蔡先生不再像李小龙，而像中国古代的孙子：不但精于行军布阵，还善于撰写兵书；既是军事家，也是军事理论家。

在《译路历程——我译〈大卫·考勃非尔〉的回忆》里，蔡先生娓娓述说翻译狄更斯巨著的经过，详谈翻译战场上的“地雷”，亲切而动人。读者看了，可以获得不少启发，翻译时知道何避何趋，也知道翻译小说时如何善用回目，如何创造嘉名。这篇文章由蔡先生特别为本文集撰写，因此弥足珍贵。

蔡先生的好友余光中先生，是另一位翻译名家。——不，说余先生是“翻译名家”，只描述了冰山的一角，余先生不但是翻译名家，也是著名的学者、诗人、散文家、评论家。在当代的中文世界里，能够像余先生那样向四面八方出击，而又取得如此辉煌战绩的，真是少之又少。

余先生在诗、散文、评论方面的成就，许多人已经谈过，而且早有专书辑录。读者翻开黄维梁先生所编的《火浴的凤凰》、《璀璨的五采笔》，就知道余先生的诗、散文、评论如何广受传诵了。

讨论余先生翻译的文章，比讨论他的创作和评论的文章少；但这并不表示，余先生的翻译比创作和评论逊色。余先生说过，他有好几只手：写诗时用右手，写散文时用左手，写评论和翻译时，又有第三、第四只手供他驱遣。科学家告诉我们，海洋里的水族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习惯了某一深度，通常要在固定的水域里浮游，绝对不能逾越。